

俄罗斯的启示

王康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 大迟

【本站按】关于本文的写作情况，请参阅余世存先生的“《俄罗斯的启示》记”一文。本站幸得王康先生允许在此发表他的大作。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时隔多年，王康先生为我们提供的也只是不完全的版本。由于种种原因，文本的编辑也差强人意。我们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将王先生的文章全文奉献于读者面前。

别睡去，别睡去，工作吧，
不要让劳动停顿，
别睡去，与昏睡搏斗，
像飞行员，像星星。
别睡去，别睡去，艺术家，
不要沉湎于睡眠，
你已被永恒俘虏
抵押给了时间。

本世纪最后十年，俄罗斯精神日历揭扉于一名诗人的百年诞辰。

1990年2月10日，莫斯科城郊别烈杰尔斯基诺紧靠公墓和冷杉林的帕斯捷尔纳克墓地，世界各国诗人在圣歌和祭祀仪式中向已故诗人作世纪性的告别。翌日，帕斯捷尔纳克纪念晚会和国际帕斯捷尔纳克学术议分别在莫斯科大剧院和作家之家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已在一年前将1990年定为“帕斯捷尔纳克年”。

俄苏著名诗人沃兹涅夫斯基在题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纪”的纪念文章中写道：

20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用以解决诗人与帝国、权力与精神独立这永恒的俄罗斯矛盾。

这次世纪性和世界性的诗人聚会及其对帝国首都的精神入侵，标志着诗歌意志的历史性胜利：诗人与帝国、精神独立与权力的永恒矛盾，第一次由前者而不是后者来判定关系规则，第一次不是用暴力而是以词语来判别善恶是非，用瑞典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斯图尔·艾伦的话，就是：

诗人承担着衡量、检查、质疑的主要作用。诗歌成为与时间、变形原则抗衡的决定性力量。诗人在专制社会表面的沉默……的信息洪水中成为发言人。

帕斯捷尔纳克 1958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两年之后即抑郁而亡。诗人被称为“叛徒”、“敌人”、“颓废的形式主义者”和“反革命雇佣文人”，面临被开除国籍，驱逐出国的危险，他写信给帝国领袖说：“对我来说，离开自己的祖国不啻是死亡。因此，我请求你不要对我采取这种断然的措施。我可以老实地说，我确实为苏联文学做了些事情，将来对苏联文学可能还有用处。”当然，他到死也未能再发表一行诗。

1970 年，索尔仁尼琴也拒绝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在对这一荣誉表示感谢的同时，写信公开谴责帝国对自由的否定，并指责苏联东正教会对帝国的屈服。直到 1974 年被强行驱逐出境，他都在与帝国领袖、警察、暗探和文学检查官对峙。1987 年，出身彼得堡的约瑟夫·布罗茨基，作为本世纪第五名俄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那个讲坛上感叹道：

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是一段漫长曲折的路程。

帕斯捷尔纳克的复活，索尔仁尼琴的存在和布罗茨基的感叹，与之对应的是苏联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三个时代的终结。在俄国历史上，诗人命运与帝国兴亡难以分离，由此产生了俄国文学的全部特点。在本世纪，俄罗斯诗人成为与超级帝国相对峙和抗衡的最英勇的道德和精神力量，恢复了人类的拯救信念，以及对启示的信仰。帕斯捷尔纳克的胜利，宣告了本世纪帝国和权力对诗人与独立精神滥施暴力的终结，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再也不是一个人造的、苦难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纯正的美学和诗意的空间了。

需要申明的是，本文中“诗人”一词，泛指以语言文字创造精神价值的劳动者，“帝国”一词，指对精神自由采取镇压方式的国家。要探讨“俄罗斯（这个）永恒的矛盾”，我们须先审视一下“流亡”这道二十世纪俄国文学的风景线。

自荷马、奥德维和但丁以来，流亡就是世界文学的古老母题之一。尽管“流亡”一词具有几乎无所不包的涵义（寻找家园、生存空间、个人乌托邦对全权语言体系的对抗、本体论存在的正常形态，等等），但近代欧洲式流亡及其文学，则与社会革命和政治迫害有更紧密的联系。

十八和十九世纪之交，法国既是欧洲历史风暴的中心，也是流亡文学的温床。国民公会与帝制这两个暴政，先后将自己的所有对立面：持不同政见人士、王室、教士、贵族、吉伦特派、正统党、立宪派、共和党、哲学家、平民和诗人送上断头台，或流放到帝国边界之外。近代流亡文学三个特征始告形成：流亡文人不可避免地属于那个时代的反对者；他们很难将过去的文化遗产与他们憎恶的社会现实截然分开；同时，他们大大推进了欧洲主要文化巨流的交融。流亡文学作为帝国与诗人共享的

成果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德国流放了海涅，英国流放了拜伦，法国则把自己最伟大的诗人雨果流放出境。

世纪之交的流亡诗人对于未来时代怀有先知式的预见性和使徒般的热情。斯塔尔夫夫人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流亡文学》中赞扬她“使流亡文学意识它的目标和最好的倾向，……回到过去的倾向和奔向未来的倾向”，使流亡文学成为新世纪“伟大文艺戏剧的序幕”在长期流亡之后写道：

十八世纪过于绝对地宣布了原则，十九世纪可能会以过于无可奈何的态度来解释事物。十八世纪相信事物的本性力量，十九世纪只相信环境的力量。十八世纪希图控制未来，十九世纪却又仅限于努力去了解人类。

勃兰兑斯就此指出：“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十九世纪的晨曦照在他们身上，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奥西安式的雾气和维特式的忧郁。我们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之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不继续前一天的工作，而又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得费力地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拾起来。”

这些悲剧气质显然适用于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正如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惊人的相似一样，俄国流亡文学也具备上一世纪法国流亡文学的一切特征。然而在背景、规模、性质和成就上，俄罗斯流亡文学更近于一部史诗，更加完整和成熟。

1921年，恩格斯的私人秘书、“第二国际”的理论领袖卡尔·考茨基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中，将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作了比较后确认，俄国布尔什维克未来的发展将导致一次新的热月9日：

他们本来是以平等的普选权选出的国民大会的坚决拥护者，可是一旦国民大会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就一脚把它踢开。他们原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却建立了血腥的统治……他们在开始执政时宣称砸碎旧的国家官僚统治机器是自己的使命，却以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他们由于军队纪律的松懈而篡夺了政权……却又建立了一支新的严守纪律的庞大军队。他们原想铲除阶级差别，却又制造新的阶级差别……最初，他们无情地剥夺资本，今天却又准备把半个俄国的矿藏拱手交给美国资本家，以换取他们的帮助……布尔什维克准备对官僚政治、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借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可是在他们看来，对民主作出让步等于自杀，……没有民主，俄国就要毁灭。最后的结局是可以预见到的。不一定恰好热月9日，可是我担心，离热月9日已不远了。

70年过去了，人们不难看到，这名“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所预言的一切还是何等保守。而我们更关切的是，使十九世纪俄国文学超越帝国权力的伟大传统，还存在吗？

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得出了自己肯定的结论。

革命、内战使俄国文学的基础遭到粉碎性打击。曾经使世代知识分子感到激奋或震惊的大问题突然之间失去一切意义；传统主题和人物顷刻间消失殆尽；各种流派的论争都变得不可能，并且毫无意义；俄国文苑中所有的权威和偶像都黯淡无光。亚历山大·勃洛克预言道：整个知识界一夜之间就会发现，自己已身陷社会最底层，托洛茨基这名赤色犹太人已发出十多年后戈培尔博士在德国发出的同一威胁，“历史的铁扫帚会把你们和其它残渣余孽一起清除！”知识分子所珍爱的一切：精神自由，温文尔雅，忏悔，矫饰，对专制、警察和庸俗的蔑视，对生命的珍视、对苦难的抗议，以及对艺术和宗教的尊崇都变得分文不值。“军事共产主义”和“集体化”的艰苦岁月与未来主义的先知式预言和象征派那种堂皇唯美的神秘诗意毫无相似之处。小说家和诗人发现，他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为这片产生过天才和大师的土地举行葬礼。雷米佐夫的散文《俄国大地毁灭曲》、爱伦堡的诗作《为俄罗斯祈祷》、舒米廖夫《死者的太阳》以及普宁《罪恶的岁月》都是绝望的祷文和葬辞。阿赫玛托娃厉声质问诗人们：我们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竟没有觉察到雷鸣般的脚步声，在向我们宣布的，不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灾难性的二十世纪？”这是对象征派、未来派和意象派的救世诗句“一轮巨大的辉煌无比的太阳正在升起”的反问，阿赫玛托娃自己和其他阿克梅派诗人也曾歌颂过这轮太阳。惩罚迅速到来，逮捕、流放、苦役和枪决大规模推进。于是出现俄国历史（也是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流亡文学。俄国女诗人吉比乌斯 1922 年在巴黎悲叹道：整个俄国文学都流亡到国外去了！连高尔基也不例外，由于一篇反对十月革命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这只海燕在明媚的意大利呆了十年。

与欧洲十九世纪流亡文学和革命暴政帝国的共生现象一样，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也恪守着与帝国遥相对峙的规则。半个世纪后，布罗茨基才以伤感的激情在《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的演讲中说道：

既然我们无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希望，既然其它道路全行不通，那么让我们相信，文学是社会具有的唯一道德保险；它是戕害同类原则的矫正剂；它为抵挡高压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内容丰富多样的人生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存在的目的。

俄罗斯文学在西方的重建构成本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观，这固然与俄国流亡作家的个人声望、文化素养、人数和与西方文化界的关系有关，与极权主义的俄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西方的现实威胁及其对流亡作家的地位的影响有关；但是最主要的原因，仍然出于诗人与帝国这一俄国传统矛盾，而且更复杂和紧张。西尼亚夫斯基作为第三代俄国流亡诗人，在《大陆》季刊上发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

一文，拒不承认俄国新制度“有权代表俄罗斯文学传统”，也拒不承认“它有力量切断这个传统”。他确信，流亡文学不折不扣地是俄罗斯文学的延续部分：“一个俄国作家如果不愿意按照国家的命令去写作，他就会处在一个地下作家所处的非常危险和梦幻般的境遇之中……，他就会面临各种暴力镇压和惩罚的手段。文学已成为一种禁忌、要承担风险的事业。”从整体上看，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既是上一世纪俄国文化精神的延伸和继续，也是新时代俄国命运的特殊形式。流亡作家一开始就不是个别事件、个人生活的错位和再选择或一般的政治避难，而是具有人类意义的俄国命运在西方的承受者，绝非单纯的语言流浪，或本体存在性的、俄狄浦斯式的无家可归者。

俄罗斯流亡作家在西方的中心活动，是从源头上沉痛反思俄国极权主义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保留和继续俄国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传统，复兴支撑俄国一千多年的东正教神学和俄罗斯基督教哲学，探寻俄国与西方世界的未来关系。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布尔加科夫等俄国思想家，从 20 至 40 年代，在巴黎、柏林、布拉格、华沙及美国等地，创立了“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院”、“俄罗斯正教神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研究所”、“俄罗斯大学”、“俄罗斯文学艺术剧院”，创办了《俄罗斯沉钟》、《俄罗斯之声》、《东方与西方》、《路》杂志以及《俄国新讯》（日报）、《俄罗斯思想》（周刊）、《面面观》、《播种》（月刊）、《新评论》（季刊）等。到索尔仁尼琴的流亡时代创办的《大陆》杂志，已成为现实俄国社会和精神发展的西方窗口，它除俄文外，还用欧洲几种主要语言出版，其宗旨建立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宗教理想主义、反极权主义、民主与超党派的基础之上”，其目标是“以文学、社会、政治与宗教的健全发展”“拯救俄罗斯”。

与俄罗斯命运的精神联系，是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自下而上地发展，提供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人类悲剧的高峰视角，从而赢得西方文学界的尊重的根本原因。与艾略特、庞德、萨特、阿多尔诺等西方作家对人类的荒芜感和绝望心情相比，俄国流亡作家更能自觉地拒斥二十世纪独有的强大的虚无主义和末世情怀。对世界的总体观念、对人的本质的终极性评论被国家性质的意识形态化之后，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价值体系、文化意识和伦理学说的冲突使其它一切冲突都相形见绌。因而知识分子、作家和诗人的承受和表达的事物，空前困难和艰危，因而也更接近二十世纪总体悲剧的本质。

布罗茨基这位已适度西方化的俄国诗人，在诺贝尔文学奖集会上演讲时告诫西方说，将俄国的经验作为警钟是有意义的。西方世界迄今为止的社会结构从整体上说与 1917 年前的俄国是相同的。十九世纪正在西方继续，它在俄国却走到了尽头。布罗茨基称，如果我说它以悲剧告终，首先指的是社会或年代沿革的路线。“因为

在真正的悲剧中，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本世纪俄国流亡文学正是通过与俄罗斯命运的联系，以自己的语言抵达时代的本质。它近期对其祖国凯旋式的回归，也正是历史精神本身法则的显现。毫无疑问，俄国流亡文学将根本修改二十世纪用语文学的总体评价，是继屠格涅夫、赫尔岑、奥加辽夫和涅克拉索夫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俄国侨民文学之后，“对世界文化的历史性服务”。

然而，真正蔚为壮观、悲怆而激人沉思的启示，更主要地来自那些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以其生命和精神的最高形式直接构成二十世纪俄国和人类本质的俄国诗人身上。

在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墓地作为俄国命运的悲剧性风景，真象征意义甚至超过诗歌，是以诗人生命凝结的俄罗斯启示的封页。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会羡慕他们十九世纪的前辈，他们回首一生的时候，能分辨出人生道路或事业发展上的里程碑，总有某些事件可以标志转折点，新阶段的起始。他们可以对战争、农奴制、沙皇、教会、土地和死刑发表宏论，可以同整个俄国社会探讨个人内心危机和俄国的命运；他们创办杂志，建立文学团体，在艺术沙龙中为西方的堕落忧郁；他们享有自由旅居国外和被视作时代先驱流放西伯利亚的殊荣，拥有在最后一刻从绞刑架上被特赦的奇遇，能够在决斗中名垂千古；他们可以从容书写遗嘱，挑选一方净土以作永久的归宿，而他们的逝世则常常使俄国和世界都陷于悲哀之中。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和五万彼得堡人不容任何延迟地要对令沙皇难堪而又无可奈何的普希金致哀，尊他为“太阳”；屠格涅夫一纸遗嘱便将其灵柩从巴黎运回彼得堡，葬在挚友别林斯基墓旁；彼得堡大学学生征集了数百人签名，把慰问信送到垂危中的涅克拉索夫病榻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以及“俄罗斯革命的整个司令部”与千千万万市民为这位写下《在俄罗斯，谁能幸福而自由》的诗人送葬；至于托尔斯泰，这位“沙皇专制制度、农奴制和一切俄国邪恶势力的死敌”，当他把在位沙皇痛斥过，把俄国一切黑暗都尽情揭露之后撒手而去时，在那个乡村车站，挤满了政府代表、省长、总理大臣的专员、宪兵军官、大批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全世界的电报线和海底电缆，各大报刊都争相报道他的死讯。在托尔斯泰之前，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遁世者在其临终时受到如此广泛的注目，连沙皇、杜马和内阁也一致“为俄罗斯失去其最伟大的作家而表示哀悼”，全国娱乐业自动停业，大学生则以违抗法令、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的方式来纪念他们的导师，托尔斯泰的遗体由专列运载，缓缓而行，农民们在白色亚麻布上写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的好处将永远铭记在我们这些成为孤儿的农民心里。

他的墓地，是七十五年前少年托尔斯泰在那里埋下一根“绿树枝”的小山坡，那“绿树

杖”是托尔斯泰整整一生都在探索和实践的启示物：毁灭人类一切罪恶，促使人类象兄弟般相爱。托尔斯泰英文传记之一的作者艾尔默·莫德在其长达一千余页的书中最后写道：

为了赢得人们的爱，真诚地寻求这个启示的人，在他的探索中无需完全成功。他甚至可能会失败，然而他的榜样却比在物质世界所能获得的最辉煌的成功，更足以使得人生更有价值。

托尔斯泰从未读完这整部启示，因为没有人完全读过它。但是他探求它，这个事实就给他的从《少年》到《我不能沉默》的全部著作，提供了答案。毫无疑问，《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的作者表明了这个启示的一大部分。

这个启示，在二十世纪的俄国，以一种奇绝、隐蔽、内在而黑暗的渠道继续被探索，被解读。它以一种近乎潜水的姿态、变形得难以觉察的轨迹经历了漫长的世纪性狂澜。[禁书网 大陆直连 https://goo.gl/C6xxGf](https://goo.gl/C6xxGf) 看 [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诗歌日历似乎有情于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十九世纪大师们的遗产甚至超过了西方，诗人高居于帝国权力之上，大声宣告了旧时代的消亡。1910年，不仅是俄国，也是欧洲和全世界的精神巨人托尔斯泰溘然长逝时，20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就站在向这位大师遗体告别的人群之中。是年，勃洛克30岁，古米廖夫24岁，曼杰施塔姆与阿赫玛托娃分别比帕斯捷尔纳克小一岁和大一岁，15岁的叶赛宁正带着俄国牧羊人天真的目光出现在彼得堡文学沙龙……

然而，俄罗斯诗歌意外地撞上了“真正的、非日历的二十世纪”，阿赫玛托娃已经听到了“历史大溃退”的脚步声：

缪斯去了，踏着一朵

秋天的、陡峭的羊肠小路，

一双黝黑的脚

沾满了大颗大颗的晨露。

我久久地向她恳求

和我一起等到冬天再走，

而她说：“你怎能在这里呼吸？

这里可是一座坟墓！”

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十九世纪俄国诗人之墓远离帝国中心，它们散布在修道院旁长满亚麻和荨麻的粗砂地里、小山坡的林中空地，却被尊为俄罗斯永恒的精神圣地。而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的墓地，则更接近无迹可寻、难以企及的骷髅地：

1921年，在勃洛克死后两星期，古米廖夫倒在行刑队枪口下，身为“人民的敌人”，他的墓地只是诗人最后的呼吸和目光：没有让他开口。临终前不久残存的诗札写道：刽子手将砍下我的头。

1938年12月27日（这一日期，直到二十五年后的1963年诗人被“平反”后才得到确认），曼杰施塔姆作为一名疯子在饥饿中衰竭而死。免去新政权的“九克”。他被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称之为“海参崴”）的一个集中营转运站（所有俄国文学史家都无力指出这个站名）。布罗茨基从这位与他同国同种同行（俄国犹太诗人）的“死地”发现，二十世纪俄国诗人与帝国的对立，“纯粹是极端之间的官司”，诗人占据和重造了时间，而帝国“无声的空间”“对此天然怀有敌意”。因此，曼杰施素，诸如语言的逻辑、历史环境，她同时代人的素质等等造成的结果”，她只能“忠于自己”，她是“自己的囚徒；这种堡垒比彼得保罗要塞还要牢固”。就是在这种孤绝状态中。女诗人仍然以精神的纯粹和内心激情战胜了把她碾为粉末的帝国，“这位诗人虽然和她周围的生活相隔如此遥远，却用了最革命的诗体和富有挑衅性的革新；因此，比起那些试图徒劳地用政治约束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桎梏来驾驭诗歌并遵循政党的路线的御用诗人来，她就更真实和更深刻地代表了她那个时代的精神”。今天，帕斯捷尔纳克的预言终于应验：

她的作品的出版对俄罗斯诗歌将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和伟大的发现，这一珊珊来迟的礼物必将立即充实并一举震动俄国诗坛。

苏联帝国终于在这位女诗人遗骸面前放下它的权杖：1961年，诗人六十周年诞辰之际，出版了她的诗选，四年之后又出版了一本厚达八百页的诗集。无论在东方或西方，茨维塔耶娃都彻底战胜了死亡，进入不朽的大师之列。

如果说茨维塔耶娃是孤独精神高翔于帝国疆域的罕见的事例，帕斯捷尔纳克则是在从俄国历史中寻找抵御新帝国的俄国的普鲁斯特。他代表着那个优雅、困惑、忍受和过时的俄罗斯。美国历史学家休斯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在官方压力下低了头。包括他在1937年写信帝国元勋丧妻悲哀的举动，都是因为他被帝国视为“苏维埃以前的残余”，“他的声音是旧时代的声音：这是他的反抗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可是他的经验教训在年轻的一代中并未消失”。

对于索尔仁尼琴这一代人，诗人与帝国的对峙已不再是力量悬殊的较量了。因为索尔仁尼琴是在死亡带上办自己挣到了国际性的写作声誉，“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成熟的作家，一个经历过战争的强劳营的老战士，是一股不屈不挠的道德力量”。索尔仁尼琴把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命名为《为人类而艺术》：

我深知自己责任之沉重。借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的话，便是：

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

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

在集中营疲惫的长期徒步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着，要向世界吐出长久哽塞在喉头的郁结，希望这世界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人的申诉。此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代表我们的这位幸运使者，他只需放声呐喊，整个世界必将报以回应。……

最堪嗟者，莫若许多默默无闻的同道，生前竟未有发表作品的机会。整个民族的文学，随他们一道远远摔落在后，掩埋之时。竟无棺枢墓志，被剥得赤条条地，只除却系在足趾上的一只号牌。但是俄罗斯文学并没有断气，只是从外面望去一片荒凉景色罢了。……

然而世间最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它的文学命脉为暴力所斩割。这和禁止“言论自由”不同，乃是桎梏民族心灵，和民族记忆的割除。……象阿赫玛托娃和礼米亚京这样的文学天才如果一生被活埋了，要他们在坟墓里默默地创作，对自己的作品不闻丝毫反应，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不幸，同时也是所有民族的悲哀，对所有国家而言，更是一种危险的威胁。

有时威胁更及于人类全体：由于此种哑默之故、人类历史嘎然中断……由谁来折中缓和对立的价值规范？谁来给人类创定判别善恶好坏的唯一准则？要如何决定可忍与不可忍之别？谁来廓清真相使人类全体得知孰为不可忍之真恶，并将举世之愤导向真善？谁能把这种了解贯穿个人经验建立之屏障而沟通人心？谁能在顽固狭隘的人性本质上注入恻隐，分负世人之悲欢，并使举世能透视生活中不曾经验之事实与虚幻？……

幸而我们有另一种手段！那便是艺术，那便是文学。它们……能够把人生的经验，把整个民族数十年间各尝艰苦、历经辛酸所得来的宝贵教训，交付给另外一个民族。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这种经验中可能拯救一个国家，俾不至步及危险、错误与毁灭之途，并从而减短人类历史之曲折与重复。……是的，俄罗斯文学几十年来走着这一方向：努力不使自己在自我陶醉中迷失方向，并避免任意瞎闯。我并不对此传统感到羞耻，并愿尽绵薄使之得以持续下去。这种思想已经长久在俄国文学中生根：一个作家必须，而且可能力大众做出极有意义的事。……

我深信世界文学有力量在此存亡绝续之时，帮助人类去认知并唾弃居心不善者和他们的组织所企图灌输的一切；沟通各地域人类浓缩的经验以终止人类继续分裂；使世界各族能深刻而正确地去了解彼此之历史并感同身受……

朋友们！倘若我们仍有丝毫价值可言，让我们携手完成此一使命吧。在阶级、运动、党派所撕裂的国土里，有谁自始便关心人类的统一？这基本上是作家的责任：“我们是民族语言的代言人，是结合民族并从而结合世界使成一族的主要维系力，可能

的话，更是人类崇高灵魂的表征。……

朋友们，这便是为什么我认为在世界正面临空前残酷的考验之际，我们能帮助它的地方。我们不应妥协束手待毙，我们不应空度岁月、沉沦在无意义的生活里，我们应该走出来参加战斗的行列。……

在帕斯捷尔纳克之后，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俄罗斯文学的整体写作从未中断。索尔仁尼琴 1974 年被驱逐出苏联之前，曾在地下状态阅读了卡拉万斯基的《请求书》、马尔琴科的《我的供词》、布罗茨基的《长短诗》、尤里·艾亨瓦耳特的《在刀口的锋利面》、阿马利尼克的《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以及曼杰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曼杰施塔姆的回忆录《一线希望》、楚科夫斯卡娅的回忆体小说《严峻的历程》、瓦拉姆·萨拉莫夫的《科雷马河的故事》、叶甫盖尼·金斯堡的《进入旋风》等作品后预言道：“将来一定还会浮现出更多这类著作，因为俄国不久就将进入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

在五十年代俄罗斯大地仍然冰封雪闭时，索尔仁尼琴在铁丝网后面写道：

我知道，我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我知道，我已经接触到了一个伟大的秘密。在古拉格群岛分散的一个个小岛上，在同我一样孤独的胸腔中，这个秘密正在人不知鬼不觉地成长起来，为的是在未来的年代，也许是在我们死后，显露出它的威容，汇成整个狂涛怒吼般的俄罗斯文学。

一个民族的历史永远取决于那个民族对自己处境的正确认识，对自己命运的有想象力、有勇气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命运最终是民族主观精神自我显示的结果，而诗人作为民族意识、记忆和灵魂的最敏慧的触角，负有特殊的使命，尤其是在邪恶泛滥、普遍沉沦的时代，诗人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用艺术拯救世界的天职。正是这种通过民族（空间）和世纪（时间）表现人类本性、命运和无限性的共同选择，使俄罗斯诗人具有二十世纪无与伦比的深沉、坚韧、感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比西方文学更自觉和更本质地体现了二十世纪的人类精神，同时，也正是这种深植于俄国血肉生活之中的艺术力量，使俄国诗人拯救了俄国历史中的精神原型，就是以整个民族和一个世纪的声音对希腊哲人和丹麦王子

那个问题的回答：

分手的时刻到了，

让我去死，你们活着……

1867 年 10 月，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鲁宾斯坦为托尔斯泰举办的专场音乐会上，当弦乐四重奏弹出柴可夫斯基的“D 大调如歌的行板”时，托尔斯泰突然啜泣了，柴可夫斯基本人深受震动。托尔斯泰此时正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半部，从“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转向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

我懂得了，它不是偶然的病痛，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这些问题不断发生，答复它们乃是必需的。问题似乎是一些愚蠢的、简单的、孩子气的，可是我一碰到它们，尝试着要解决它们，我立刻肯定了（一）它们不是孩子气的，不是简单的，而是最重要的，最深刻的人生问题；（二）我尽力试图解决，但我决不能解决它们。俄罗斯的忏悔精神可能导向一种偶像崇拜，从而分娩出它最卑下的元素契诃夫痛斥过的俄国人血液里的“奴性”，以及为现阶段人类文明尚难接受的“不以暴力抗恶主义”；但这种精神作为人类神性的伟大证明之一，是可以保证人类不会沦为兽欲，不会向邪恶彻底屈从，在苦难和少数尚存的世界里，尤其是对中国诗人日益浓重所谓的“个人化”，仍然是一种本质的需要。

索尔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纪俄国的悲剧时问道：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我们的血统？

“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是我们的。”

俄罗斯伟大忏悔精神在半个多世纪的苦难里支撑着俄国诗人的生命，使他们从内心认识到罪恶和邪恶的根源，从而祛除狼种。“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条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扬扬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认识你自己！……民间谚语说，从善到恶，一念之差。”索尔仁尼琴作为在精神道德上比帕斯捷尔纳克等纯诗人更为纯洁、优秀的俄国知识界无可争辩的代表，在古拉格群岛的苦难中心把十九世纪俄国忏悔精神提升了一个世纪的水平，他发现：善与恶的界限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保持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压缩。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历史上一切革命之虚妄：它们只消灭各时代的恶的体现者，而在匆忙扰乱中也不加分辩地消灭着善的体现者；至于被更加扩大了恶的本身，它们却当作遗产继承下来。

“认识你自己！”对自身的罪过、失算和错误进行触及痛处的思索最能促进我们谅解一切的觉悟。在这样的思索中绕过了几个艰难的、需要走许多年的圈子之后，每当别人对我说起我国大官们的冷酷、我国刽子手们的残忍我总回想起带着大尉肩章的我，回想起我的炮兵连在炮火纷飞的东普鲁士土地上进军。于是我说：“难道我们比他们好吗？”

从普希金开始，俄罗斯诗人就是拉着苦难俄国艰难前行的马。无论是整个俄国文学界，还是在诗人个人身上，总是圣徒拉着天才的手，殉道者扶着歌者的肩头，哲人劈开诗人现下的荆棘。

俄国诗人按勃兰兑斯在《俄国印象记》(1888)中所说，其气质是“伟大的、愁郁的、富于极端住的”。这一切都深深地植根于俄国整个独特的生存环境与传统之中。这些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地理环境、民族关系、宗教信仰和帝国主义。

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如美国俄罗斯历史学家亨利·赫坦巴哈所说，俄罗斯人民在大草原上继续生存并且终于征服这个大草原，是历史上伟大的给人深刻印象的事件之一；没有自然屏障的茫茫的草原“瀚海”不仅激发了一种远达天涯海角的冒险精神，而且形成了俄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二，俄国在欧亚大陆所处的中心地位允许并且甚至鼓励它朝着相反的方向欧洲和亚洲退却和扩张交替更迭。西方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两点是形成和推进俄罗斯救世主义和帝国扩张主义的主要本质因素。

历史的发展也极为巧合地助长了地理因素的影响，自从 1453 年拜占廷垮台以后，势力极大的教会僧侣集团就开始传播“莫斯科是新的上帝城，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继承者”这一概念；修道院院长菲洛费声称，上帝的历史明显地指向莫斯科，俄罗斯将要实现上帝的绝对意志。莫斯科的王公贵族，外交官，僧侣和一般民众，至此开始把自己看成新的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同时，沙皇在把自己与罗马凯撒的概念联系起来以前，早已同金帐汗的遗产联系起来了。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伊曼纽尔·萨尔奇斯扬兹指出“如果莫斯科国的统治者作为罗马皇帝的后裔和拜占廷皇帝神圣的继承人向西方推进的话，那么他向东方推进，就是作为那个伟大的蒙古人的欧亚帝国的汗的继承人”。于是，帝国诗人费多尔·丘切夫赞颂道：

在面貌改观的拜占廷土地上

基督的圣坛将重新被奉祀

于古代索非亚的殿堂！

啊，俄罗斯的沙皇

跪例在圣坛的面前吧，

于是起而为全体斯拉夫人的沙皇。

在欧洲十八世纪启蒙主义的近代民主政治被普遍接受以来，在俄国却发展出另一种独特的世界主义和来来图式，即俄罗斯的特殊命运和使命。亚历山大·赫尔岑，这位十九世纪俄国最渊博的思想家和西欧通，认为“斯拉夫主义或俄罗斯主义不是理论或学说，而是受到伤害的民族感情……，即对外国影响的一种反作用，而这种影响从彼得一世最初让人们剃胡须时候起就存在了。”

这种受伤害的民族自尊心也来自俄国社会内部受西方文明影响，认为俄国的得救在于接受西方的价值、文化和自由主义的理想的知识分子。在 1826 年到 1850 年二十五年里关于俄国历史性质大辩论中起了触媒作用的彼得·恰达耶夫认为，俄国历史没有任何高尚的或鼓舞人心的东西，“我们从不知道在这个民族中有过象其他民族一样的一个精力充沛的活动和道义力量发挥崇高作用的时期。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与现时相似的这个时代是以黯淡而枯燥的生活为特点的，我们的社会只是由于受凌辱才振作一下，只是由于受奴役才宁静下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吸引人的回忆，也没有优美的形象，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没有不朽的教益。世界上一切民族中只有我们才对世界毫无贡献，我们对人类精神和进步从来没有任何贡献，我们一直玷污了它。”但是，自从克里米亚战争和欧洲 1948 年革命失败后，俄国救世主义迅速占了上风并激化成亲斯拉夫主义，这种亲斯拉夫主义一开始就面对着在历史进程中难于把基督教救世论和俄罗斯帝国命运截然分开的矛盾。亲斯拉夫主义从俄国东正教传统出发，认为俄国精神的谦逊和公共性、强调集体、社会高居个人之上以及兄弟和睦友爱，比起折磨西方世界的利己心和物质主义更能在精神和灵魂上革新俄国和世界，更符合基督教关于真理、慈爱和精神自由的圣训。

康士坦丁·阿克萨科夫甚至把俄国公社（村社）看成上帝之城的雏型，“一个公社是那些已经放弃利己心和个性的人们的联合，这些人表达了他们共同的心愿；这是一种挚爱的行为，即基督教用它的其它多种言行多少清楚地表现出来的一种高尚行为。因此一个公社象征了一个正义的教堂合唱队，正象在歌唱队里一样，个人的声音并没有消失，而是按照共同的音调让人们听到所有人的和声；所以个人在公社中并没有被埋没，而是放弃他的唯我独尊的态度，赞成共同的心愿；于是有理性的人们自觉地和睦共同生存的高尚现象应运而生；一种兄弟关系即一个公社就出现了；这是人类精神的巨大成功。”

美国拉特格斯大学“东欧和苏联地区研究计划”指导塔雷斯·亨札克在《泛斯拉夫主义或大俄罗斯主义》一文中写道：“这些浪漫主义的思考把俄国的整体看成是渗透俄国各阶层生活的固有准则的产物，有助于预示俄国救世主思想的出现。这种救世主思想为黑格尔关于文明史发展的协调性观念所补充，即在不同时期，一个民族在文明发展方面被赋予了揭示绝对精神的使命。亲斯拉夫派认为拯救世界是俄国的命运。这种宇宙神教对无论何种救世主的抱负均可适用，它却由于亲斯拉夫派要把俄国和东正教教会、它的组织以及复兴人类的理想等同起来而被制造得适合需要。”

自从普希金在 1931 年写了《给诽谤俄国的人们》一诗后，俄国诗人就深深地卷入俄国命运的旋涡之中，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亲斯拉夫主义发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群魔》中，他为俄国的民族主义下了一个完整的、独特的定义：“对我来

说，人不过是个俄国人，上帝不过是俄国的上帝，习俗不过是俄国的习俗而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民族主义使命感，最典型地代表了俄国救世主义精神，他借他的旧我沙托夫说出：“如果一个伟大的民族不相信真理只在于此，如果它不相信只有它才能而且已经被选定靠它自己的真望使每个人上进并得救的话，那么它就立即成为人种志的材料，而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能甘心于它在人类事业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是经常地和专门地扮演主要的角色。”然而，对帝国缔造者和继承者们，他们对俄国救世主义之所以感兴趣，则主要出于帝国势力和利益的世俗需要，旧俄帝国除了在极少时期内，实际上是非意识形态化、非神圣化的。俄国诗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彻底的亲斯拉夫主义者，都绝望地发现，正是在俄国，保留着与基督教救世精神格格不入的农奴制、鞭刑、绞刑、流放和整个国家机器的邪恶与罪孽，这就在俄国历史上出现了另一件比西化派和亲斯拉夫派的论争更深刻、更重要的矛盾：俄罗斯帝国本身、沙皇制度本身能否体现俄罗斯救世精神？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开始，俄国诗人与帝国在精神上的离异就开始了，准确地说，俄罗斯诗人与帝国的决裂始于 1839 年，别林斯基在《鲍罗廷诺纪念日》中遵循俄国历史命运的“正当性和必然性”鼓吹“沙皇”一词“充分表达并彻底穷尽了俄罗斯人民的意识，在同沙皇的关系上，“祖国”是一个“从属的概念”。虽然半年后，别林斯基“撤回”了那篇文章，并对自己写下“这一贫乏的历史瞬间成为一种绝对权利”深感失悔，但还是导致了赫尔岑和他的断交。1855 年，当果戈里在法国撰文称颂帝国时，别林斯基发表了著名的《致果戈里的一封信》，斥责果戈里“散发出来的，不是基督教的真理，而是对死亡、魔鬼和地狱的屈从！”别林斯基在同一封信中指出了那个时代俄国作家的使命：

这不是有关我或您的人格问题，而是不仅比我，甚至此您也高得多的问题：这种关于真理，关于俄国社会，关于俄国命运的问题……普希金只写了两三首忠君的诗，穿上了宫廷侍从的制服，立刻就失去人民的爱戴！

[禁书网 大陆直连 https://goo.gl/C6xxGf](https://goo.gl/C6xxGf) 看 [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整个十九世纪，俄国诗人的苦难都可以归因于作为俄国诗人共同遵奉的俄罗斯弥赛亚主义与邪恶、专制的帝国权力的矛盾。俄罗斯弥赛亚主义，也就是托尔斯泰圣寺的“绿枝”秘密：

即使我们从来没有听到它被解释过，或者试图自己去解释它，在我们心中都有一种对基督教根本教义的内在的深刻信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一位父亲的孩子，是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不论我们在何处居住，不论我们操着何种语言，我们都是兄弟，只服从于我们共同的父亲在我们心中植下的爱的律令。

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作品中与魔鬼真正对峙的索尼娅、帕斯杜尔纳克的拉丽莎、格罗斯曼的叶尼娅所标识的俄罗斯灵魂的核心俄罗斯的弥赛亚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提出俄罗斯精神对世界的意义时坚信，俄罗斯精神在于比西方更彻底地摒弃了一切蒙昧主义和偶像崇拜，发展出更为深刻而独特的忍受和消解苦难的智慧。“俄国的使命就在于东正教，在于它的东方之光，它将指引西方盲目的、失去了基督的人类。欧洲的不幸，一切的不幸，无一例外地都起源于与罗马教会同流合污而丧失了基督，而且后来还以为没有基督也可以生活”。尽管晚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撇开了帝国的罪孽，深入到人性邪恶的深渊，发现了能“超越善恶”的拉斯格尔尼科夫的可怕住，尽管托尔斯泰很早就转向宗教和人的得救问题，但是他们都无法预见二十世纪俄国诗人遭逢的更为残酷而复杂的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旧俄国”对他那个时代和他所预感到的世界性演变与恐怖，对即将来临的全人类生命流失和价值倾覆，对他所忧心如焚的一亿俄罗斯人被魔化的未来世纪问道：俄罗斯将走向何方？对这个充满谎言、不幸和死难的世界，他的梅思金公爵、德米特里、伊凡和索尼娅作了回答：

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我们不能有别的方式去爱，也不知道有其它方式的爱。为了爱，我们甘愿忍受苦难，我希望，我渴求流着眼泪只亲吻我离开的那个地球，我不愿，也不肯在另一个地球上死而复生！

克鲁泡特金在本世纪头一年谈到俄国文学的命运和理想时，认为，托尔斯泰那句话“最好的艺术是人人懂得的”，虽然在艺术上甚成问题，“却是一种伟大的理想的根苗”，他预言说，在新的世纪，“是在被人发扬光大的”。

十九世纪俄国诗人的“放逐、牺牲和死亡”，居于世界各国之首，二十世纪俄国诗人的死亡率（包括自杀率）则达到一种整体的、纪念碑群的程度。

1852年，德国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卡尔·迪茨尔预言道：“半腐化的俄罗斯人民将以共产主义告终；对欧洲来说，一个革命的俄罗斯帝国将比沙皇帝国更加危险。因为俄国传统救世主义一旦输入马克思主义，就会爆发成为幻想的世界革命的信号。”

萨尔奇斯扬兹在《再论俄罗斯帝国主义》中写道：“斯大林的俄罗斯帝国象处于‘前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古老的莫斯科国一样，看到它本身被包围在一个敌对的欧洲强国体系的世界之中而俄国在1917年11月以后不久，即当它的首都从圣彼得堡迁回莫斯科的时候，就不再属于这个体系了。由于大多数西方化的优秀分子被布尔什维克党人所淘汰，苏维埃制度多半是由俄国比较非西方化的阶层加以逐渐发展起来的。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少数派的胜利，即俄国最西欧化的革命意识形态的胜利，恰恰是终于使俄国摒弃西方化。

二十世纪俄国弥赛亚主义受到其本质迥然不同的因素（国家至上、领袖崇拜、科学理性、历史规律和高度世俗化的意识形态，等等）的强力改造，其结果当然首先是整个自由俄罗斯文学界的消失，其中尤为引人深思的是几位怀着俄国传统弥赛亚主义情怀的诗人献身新帝国时出现的自杀悲剧，换言之，是他们与新帝国决裂后对俄国诗人本性的弥赛亚情结的回归。

年轻的叶赛宁是继勃洛克之后第二位在二十世纪新帝国内自杀的诗人，他“曾站在十月革命一边，是最激进的同路人”，但他很快发现新帝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摧绞他的“大自然母亲”，他在最后一首诗中写道：

“我不是个‘新人’。我一只脚踏地过去……”

1921年，当卢那察尔斯基为马雅科夫斯基辩护，称“未来派支持共产主义”时，新帝国创始人答道：“他们那一套是流氓主义。”帕斯捷尔纳克就此写道：“马雅科夫斯基生命最后几年，那时什么人的诗都不存在了，他本人的诗不存在了，别人的诗也不存在了；那时叶赛宁自缢而死；他的作品被强行推广，如同叶卡捷琳娜时代推广马铃薯。这是他第二次死亡。这次死亡，责任不在他。”帕斯捷尔纳克以过来诗人的心情写道，马雅科夫斯基“开枪自杀”，是“由于他谴责了自身中的某些事或周围某些事，而这些事是和他的自尊心水火不相容的”。至于法捷耶夫，这位一度主宰用作家的“作协书记”，帕斯捷尔纳克觉得他“是带着他那内疚的微笑，从种种政治诡计中走了出来，在最后一刹那，在开枪之前，又带着这种微笑，跟自己告别”。英国学者G·霍斯金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外》中评论法捷耶夫的自杀时写道：“他曾在政治大清洗时即使不是扮演一个极端可耻的人物，也扮演一个暧昧可疑的角色，使得他的几位老朋友和老同事惨遭处决。……法捷耶夫不合时宜的使官方犯难的自杀的真正原因是良心上受到谴责”，觉得自己在斯大林时期的全部活动，也许还有他自己的整整一生，铸成了一种悲剧性的、毫无价值的错误。”无论如何，他们“最终都没有放弃自己年幼熟悉和牢记的东西”。

由于痛失诗人本性而以死向所属弥赛亚主义传统回归，这是二十世纪俄国诗人独具的生命景观。其中最圣洁、纯正的回归是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写道：“她在惊恐中躲避起来，在恐怖面前她不知所措，便仓皇躲进死亡，她把头伸进绳套，如同把头埋在枕头下一样。”自杀者还有帕奥洛·亚什维里、伊萨克·巴别尔、亚历山大·维斯基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在追问二十年代以后几位俄国第一流诗人自杀的原因时，认为他们：

对自己表示绝望，抛弃了过去，宣告自己破产，认为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这些回忆已经不能接近这个人，不能拯救他，也不能支持他。内在的连续性遭到了破坏，个人结束了。也许，不是出于信守决定，而是忍受不了那不知属于何人的烦恼，忍

受不了没人感到痛苦的痛苦，忍受不了这徒然的、令人绝望的期待，而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由于这种“内在连续性和回忆”的中断。俄国诗人丧失了自己的本质，帕斯捷尔纳克深知，“他们的痛苦是笔墨难以描绘的，他们的痛苦使忧愁变成一种心病。他们的才能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的行为是值得纪念的，除此之外，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

与帝国权力结为一体，对二十世纪独特的俄国罪恶的协从的俄国诗人，就彻底地丧失了自身的自由本性，这在十九世纪是不可想象的。在 1937 年到 1939 年的政治清洗中，“苏联作家协会”以及阿列克赛·托尔斯泰、斯塔夫斯基、伊万·卡达耶夫、亚历山大·斯威尔斯基等帝国文人公然站在独裁者和刽子手一边，把他们白净的手指伸进替罪羊的血泊。阿·雷巴科夫在《从阿尔巴特街到西伯利亚》中写道，“要知道，这是作家！作家啊！他们是人民的良知。象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等”。马克·斯洛宁指出，阿·托尔斯泰备受帝国青睐，“他甚至留用过去的仆人，他的仆人常常在电话中这样回答对方：‘殿下这会儿在党中央委员会’”，1945 年，这位“托尔斯泰同志”逝世的消息是用一份特别电文向全国公布的，签名的有政府、党、军队、科学的官员，他的殓仪场面相当于国葬。尽管如此，“每当他试图进行说教而越出一名小说家的职责时（例如他曾试图依据党的路线替凶残的暴君涂脂抹粉而写的最后一个剧本《伊尼雷帝》 1943 年），他就遭到失败，写出了矫揉造作而又低劣的作品。

至于苏俄帝国最成功受宠的诗人肖洛霍夫，当他对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进行攻击，以及他对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和其他被镇压的受害诗人采取敌视态度时，苏俄知识界对他则采取了采取沉默的鄙夷态度。1966 年，肖洛霍夫在苏共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咒骂被判苦役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指责对他们的判决“大温和”，说是如果在二十年代，他们早被处决了。这种公然站在帝国对诗人的暴力政策一边的行径，“大大损害了肖洛霍夫在国内外的声誉”。女作家丘科夫斯卡娅在公开信中，“谴责肖洛霍夫背叛俄国文学最优良的传统，扮演了歪曲真理、用谎言代替正义的残酷检查官的角色。”文学界对肖洛霍夫是《静静的顿河》的真正作者这一点也提出了问题，1943 年，这位苏俄帝国文学泰斗的档案与几年前高尔基和几年后法捷耶夫的档案一样被销毁。

与自杀者、丧失本性者、误入歧途者和卖身投靠者不同的，是另一类俄国诗人，二十世纪俄罗斯启示的主要体现着。他们面对的困境带有更为全局和根本的性质：十九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弥赛亚精神在二十世纪处于什么样的情形，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条件下，还应不应该、可不可能重新坚持和推进这一精神？

无论人们对 1917 年以来的俄国历史作如何评价，下述一点是最为重要的：俄国上几个世纪蓄积起来的俄罗斯救世主义和弥赛亚精神，尤其是其中俄罗斯的特殊使命、平等观念和人类理想，确实在文化内层结构和民族伦理基础 and 传统心理系统方面为新帝国所声称的作为帝国学说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历史性的基础。

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俄国的特殊劫难。美国著名苏联问题权威斯蒂芬·科恩在《苏联问题重探》一书中写道，“关于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死于非命的人数，至今还没有能作出精确的统计。从事这方面调查的人们认为，2,000 万人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这还不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可以归咎于斯大林领导上的疏忽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数百万人员伤亡，也不包括关押在斯大林集中营里达 20 年之久、奄奄待毙的数百万人”；索尔仁尼琴在致帝国最高权力集团的公开信中写道，“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共丧失了 6600 万人！！！这个数字是原列宁格勒教授、统计学家 N·A·库尔干诺夫计算出来的。”

应当客观地说，俄国二十世纪历史是一个异常复杂和变化不定的问题，俄国诗人对七十年新帝国的反思也从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十九世纪关于俄国社会性质与西方的关系和在这片欧亚大陆上生息的各个民族的依存形式。由于苏俄帝国的疆域和实力，它那正在激变的社会必将深刻地、甚至永远地改变人类命运。与西方大国不同的是，俄罗斯诗人在俄国命运的演变中一直是潜在和公开的强大声音，这一声音和整个苏俄社会交织在一起，分担和影响着俄国与世界的命运。苏俄诗人对二十世纪难题的消解，首先是继承了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的伟大传统，直接与帝国抗衡。

1881 年和 1901 年，托尔斯泰两度致信沙皇，公开抨击“历代沙皇都是怪物和疯子”，指责帝国“坚持对俄罗斯人民施行暴行”，声言“独裁是一种过时的政府形式”。

索尔仁尼琴在一个世纪后发出《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他警告统治者：“全部世界历史证明：建立帝国的人永远是要遭殃的。大帝国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你们神圣的愿望：希望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不要改变，永远存在下去。但是，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每一个制度，不是发展，就是衰落。”在这封信的结尾，索尔仁尼琴写道：“在俄国历史面前，我对这封信将担负重大的责任。但是，如果不承担寻求出路的责任、无所作为的话，那么责任就更大了”。（萨哈罗夫和很多俄国知识界代表人物都认为，这位“唯一活着的俄罗斯文豪”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政治论断是过时和有害的。而我们看到，索尔仁尼琴在体现出强大的道德责任感时，也别具犀利的历史眼光。苏联帝国不可避免的解体这一根本事件，正是索尔仁尼琴关于俄国命运的思想的核心，）

萨哈罗夫则在更早一年就人权、信仰自由、政治迫害、民族纠纷、国际裁军和外交

等问题阐述了与统治者们大不一样的观点，他对俄罗斯人民的未来提出的希望是：“现在，我比以前更加感到，在无法控制的剧变和悲惨的动乱之中，维护人格的唯一真正保障是人的信仰自由、道德上求善的倾向性。”

即使在俄国最无畏、最彻底的作家和诗人与帝国坚定对峙时，他们也表现出传统弥赛亚精神所包含的对人的宽容和基本的尊重态度。

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公开信中一开始就写道：

我希望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得到安宁，越是近邻国家，越是依靠我们的国家，我越是热烈地祝愿他们。但是，我更关心的还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的命运。常言说，生地哪里，就关心哪里。更深刻地说，因为我们在那里经受了无比的痛苦。我写这封信是从下述前提出发的：你们也格外关心俄罗斯、乌克兰的命运；你们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出身、自己的父辈、祖辈曾祖辈和自己辽阔的故土；你们不是属于任何民族的人。

俄国诗人从十九世纪末期，尤其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揭示的弥赛亚主义走向歧途的可能性中，从二十世纪反复的、漫长的和巨大的苦难中已经深知，一切苦难有更深的源头。

俄国二十世纪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指出，不仅在俄罗斯，就是在欧洲，人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希特勒和斯大林式的“崇高”、“伟大”、“英明”的概念及其后果，已经被陀思妥耶夫斯基预感到了。这种预感的恐怖刻毒性，甚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深受其启示的西方文学和思想界，对人本身根本失去了信心。

但是二十世纪罪恶和苦难的规模和性质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孤立的、充满内心冲突的、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天才为之苦心辩护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到了二十世纪已经繁衍发育成一种“新人”，一代“精英”，和使如萨特、艾雅、聂鲁达、庞德等西方诗人为之神往的“时代精神”！

苏联警察首脑雅戈达及其同志们，每次洗澡前，都要向特意设置的圣像开枪射击，每次处决犯人后都要摹仿犯人临死前的可笑举动；索尔仁尼琴分析这些武装起来的制度化和体系化的二十世纪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们时指出：

麦克佩斯的理由是无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谴责。雅戈达也只是一只小羊羔。莎士比亚的恶人们的想象力和气魄也就止于几十具尸体。……历代的世界文豪莎士比亚也好、席勒也好、狄更斯也好接二连三地给我们炮制出一些漆黑一团的恶人形象时，我们感到这在现代人心目中多少有点滑稽和笨拙了。他们的恶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恶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是黑的。

“因为他们没有思想体系”，索尔仁尼琴认为，俄国二十世纪的悲剧就在于“从西方刮来的那股黑风”，“它折磨和伤害了我们的心灵”。

“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恶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恶人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倾扬和称誉。”

“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

“莎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限，有思想体系的恶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

索尔仁尼琴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把希望寄托在俄国的传统的弥赛亚精神上：

巨人般的俄国具有许多精神上的特点和生活上的传统，完全可以在人类中寻求自己的道路……。今天，除了基督教可以医治俄罗斯的灵魂外，我自己看不到任何有生气的精神力量。

索尔仁尼琴把俄国的重建寄托在他所称的正在俄国展开的“关键性过程”：

铁壳里面人们的心灵正在走向解放。这个过程在苏联已有 20 年的历史了，在别的国家里

它的历史可能短些。正成长着的新一代人，他们和邪恶作斗争的时候表现得百折不挠，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为了不出卖良心，他们宁肯失去一切：工资、起码的生活条件、甚至生命。

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斗争与和平》的《生存与命运》的作者、苏俄作家格罗斯曼，在目睹了两种极权统治在新世纪的罪行后，对“善”、尤其是“大善”提出了质询：“我看到了在俄国诞生的社会的善的思想那不可动摇的力量。我在农业集体化时期看到了这一力量，我在 1937 年看到了这一力量。我看到了人们怎样在如基督教理想一样美好和人道的善的思想名义下被消灭。我看到饿殍遍野的农村，我看到倒毙在西伯利亚雪地上的农家孩子们，我看到把成千上万的男女从莫斯科、从列宁格勒、从俄罗斯各个城市送到西伯利亚的列车，他们被宣布为伟大神圣社会的善的思想的敌人。……在那可怕的年代，人们打着国家、民族的荣誉和全世界的善的旗号干下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情！”

还能否把希望放在“善”上面，人类本性中的为历代哲人和老百姓称颂的“善”如何才能与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层出不穷的“恶”相协调，尤其是对二十世纪集中在俄国和德国出现的完全可能毁灭欧洲和人类本身的国家化的恶，从古希腊和基督教以来的欧洲文明如何对此作出解释，这确实既是二十世纪独特的难压，也是破二十世纪继承的全部欧洲文明的难题，更是二十一世纪亟需解决，否则仍然面临人类集体毁灭之虞的难题。

英国哲学家、人道主义者卡尔·波普尔从纳粹德国的教训中提出了格罗斯曼同样的问

题：历史进程中每每发生这样的情况：反对暴力的斗争起初似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接踵而来的却是失败。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彻底失败了，但我必须承认，它们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野蛮和残酷已经失败。相反，这些可憎的观念从失败中也取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胜利。我不得不承认，希特勒成功地降低了我们西方世界的道德水平。……我们使用了因受纳粹主义威胁而被迫研制的武器，这时希特勒主义的精神无疑赢得了对我们的最大胜利。

俄国诗人完全有理由因为斯大林在道德上对俄国人造成的损害，降低或取缔自己的弥赛亚主义，或者如萨特一类西方（尤其是当代法国）诗人那样，不分善恶是非，对人类采取一种旁观诅咒的姿态。正是这世纪性和全球性的、紧接在暴政和帝国的崩溃和末期的、由一批西方知识分子鼓吹的虚无主义学说的泛滥面前，俄罗斯诗人以一代一代的努力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俄罗斯弥赛亚主义与一切拯救精神一样，内含着乌托邦盲信的力量。一旦历史在十九世纪下半中地将来来自西方的另一种激进、理性、独断的救世主义传入俄罗斯，它的弥赛亚热情一旦转向，就会产生毁灭性的悲剧。在拉甫洛夫、特卡乔夫、米哈伊洛夫斯基、巴枯宁、克鲁泡特金、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亚·伊·乌里扬诺夫和约·维·朱加施维里把各种对立的西方观念引入俄国后，俄罗斯弥赛亚精神被不同的历史力量驱走，其肆虐暴烈是何等空前！俄罗斯诗人对这一切作出了承担和回应。在“除了灰烬还是烬”的新纪元，俄国诗人的成就与他们的精神自治和悲剧命运成比例发展。帕斯捷尔纳克的终生挚友，直接被帝国文艺总监日丹诺夫“点命”的阿赫玛托娃这位俄国“悲泣的缪斯”，便是用诗歌把苦难内在化的杰出代表。在世界诗歌史上，第一次由一位女诗人自愿地把爱情诗让位给悼亡诗。死亡持续的、真实的死亡成了她诗作的最后依据。布罗茨基写到：“她创作《死者的花环》这一组诗，就是让那些先她而去的死者吸收或者至少加入诗歌。她不是企图使他们‘不朽’；他们多数人已经是俄国文学的骄傲，已为自己建立了永不磨灭的英名。她在努力应付一种空虚的生活，它的意义遭到突然毁灭而变得空虚。”女诗人恪守着自己时代的诗歌信条；同死者交谈是防止话语滑为嚎叫的唯一途径。

诗人头上只“大量批发死亡的天空”，具有“远射程的心”、屈辱而死的天才密如“阴沉的有麻瘢的碎石屑”。纯正的俄国诗人自然会向苦难的最大和最后应承者俄国伟大的拯救精神皈依。

1943年，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监狱服刑时遇到一个女人。那女人“嘴唇冻得发紫”，完全有可能从未听到过女诗人的名字，“她从那种我们每个人常见的麻木中惊醒过来，把嘴唇凑近我的耳朵（那儿每个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你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我能。”于是，一丝朦胧的象是微笑的表情掠过了这

张曾经是人的脸孔。

女诗人执行了她的诺言。这就是二十世纪俄国催人泪下的伟大诗作《挽歌》最后问世的由来。

冥辰高悬在我们的头顶，无辜的

俄罗斯在痛苦地挣扎；

血迹斑斑的铁蹄下，他们要踩死她，

行列中停着囚车。

当阿赫玛托娃转向狱中的儿子时，被无情践踏的母性的绝望和对帝国的虚假永恒以及对善的最终胜利的信仰汇合成二十世纪苦难俄国一部无与伦比的史诗般的圣母颂和安魂曲的合奏，“它已为全苏联和全世界噙着眼泪传诵”：

我恳求了整整十七个月，

我的哭声把你召唤回家，

我跪倒在刽子手面前为你求情，

我的儿子，我的冤家，我的亲骨肉！

.....

假如他们真要封住我受伤的嘴，

就让那些我为他们说话的千百万人

让他们来替代我；

并让他们每年记住

每当我的祭日来临时

我不只为我自己祈祷，

我的呼声是为了那儿所有和我在一起的人们为了所有的人，

他们在寒冬腊月里，在七月的热浪中，

站在那堵不通风的深红色的墙下。

在弥赛亚精神沦丧的空前危局，诗人最先到场，以一首共同的诗把拯救精神凝结和升华为一个誓约，一项许诺，一次承担和一个秘密，借以和遥远的未来相遇。

在卡卢马集中营，很可能是出于死所必至的预感，曼杰施塔姆以天鹅将死的声音发出绝唱：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窥见你的瞳孔，

谁能用自己的血去粘合

两个世纪的椎骨？

.....

世纪象捕狼的猎犬扑向我的肩头。

但我的血统不是狼！.....

我拒绝存在
在非人的疯人院里
我拒绝生活，
同广场上的狼群一起
嗥叫我拒绝

布罗茨基明确地指出，《安魂曲》中众多的声音流定出来的同情，只能用诗人东正教的信仰来解释；其中的理解以及赋予作者辛酸的、几乎难以承受的抒情曲调的宽容，则只能用诗人独特的心灵，自我以及自我对时间的感受来解释。在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唯有诗歌可能应付现实，它将现实紧缩为可以怀抱、可以倾听的某种事物，在这个意义上，“整个国家举起了阿赫玛托娃这个笔”，更重要的是，这使诗人能为全民族说话并启示给它一时尚难理解的东西。诗人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生命和精神的纽带，是人类在苦难和困境中如何辨识和寻找希望的候鸟，是见证、回音、安慰和预告的使徒。

伟大的宗教哲学家，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二十世纪西方诗人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于 1913 年返回俄国东正教怀抱。他宣称：

在俄国东正教中可以发现比西方基督教中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人类兄弟之情，更多的仁慈，更真的谦卑和更少的权欲。

别尔嘉耶夫坚信：“二十世纪俄国和德国发生的悲剧之格外强烈，是因为救世精神贬值为道德虚无主义，也是因为过度的沉默深深淹没了一切性灵之光”。

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亲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霍来亚科夫、阿克萨科夫兄弟已建立了奠基于俄国东正教传统的信仰哲学，并与德国理性哲学和唯心论相对抗。赫尔岑把这种信仰主义与法国启蒙哲学对比后认定，亲斯拉夫派的信仰主义不仅深植于俄罗斯民族历史中，而且对缓解西方理性至上所带来的普通精神危机有着“将来的意义”。戈戈茨基和尤尔克维奇把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精神”部分结合进斯拉夫主义的信仰哲学，认为“内在的经验，即信仰，才能解决生命的最高目的。人类认识除了低级的、运用理性和经验逻辑规则获得真理一途外，还有高级的、唯有借助信仰和内在精神才能获得创造性与掌握世界的强大力量的道路。在托尔斯泰处于精神危机的同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在斯拉夫哲学传统基础上，广泛考察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新柏拉图主义、诺斯替派和教父学哲学，推进了俄国东正教神学。他认为，人道主义的原始含义是对上帝人基督的信仰。一切生命都期待着复活和复兴，即物质的充分精神化和精神的充分物质化，生命在升华了的辉煌形式中复活之后将成为真与善的永恒形式。而与文学更为贴近的十九世纪哲学是倡导象征为世界本源的弗洛连斯基。宇宙及其象征便是全部实存之物，世界只是二而一的现象本体的无限结合，

它的中介和所有形式便是象征。十九世纪俄罗斯哲学思想确实是沿着一条与西方理性（非理性）哲学全然不同的路向，并在牵涉俄国历史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同时，发展出独特的世界观，对人与上帝、精神、灵魂与尘世使命，通过象征、形象、直觉、内在道德把基督教的信、望、爱与希腊、罗马的真、善、美一体融为自己的弥赛亚主义。

无疑，无论这种粗劣勾勒的俄罗斯弥赛亚主义的文化源头如何带有一种民族优越感和乌托邦精神，却能为苦难中的俄国诗人提供一种深厚的历史和精神基础、（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精神自十八世纪以来通过俄国西化派的努力，当然也是俄国诗人抵御和抗衡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旧、新帝国的另一基础。此属另外一个大问题，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在此探讨

载自：网易/文化

王康作《俄罗斯的启示》记

特别感谢作者余世存先生寄来大作

余世存

90年代初，王康离京多日，在重庆隐居赋闲。其情形如同“呐喊”后的鲁迅。一个千万人“呐喊”过的大剧谢幕了，一夜之间，一切变得萧索、沉闷、滞重、无趣，曾经灿烂地展开其热情、良善、智慧、才华的人们仿佛经霜打冰冻，又成为漠然身外而压抑的一群活物。但鲁迅当年只能“荷戟独彷徨”，已经过了几十年的光阴，历史演绎了太多的内容、积累了太多的经验，何况王康还深知另一个民族俄罗斯近几百年的历史。无论如何曲折，个人、民族和人类的生命是有自己的起点、方向和目的的。前路更何之？在王康那里是极清晰地呈现着，他知道，他也看到了，虽然一切是非现实地存在着。这老大而多灾难的民族，虽然她曾早慧地为人类文明开辟过荣誉和方向，虽然她也很早地与其它民族接触，却迟迟未能进入人类世界的绵延大潮。

一天，王康无所事事地路过街头，经过一家卖书报的地摊，他停了下来，无意地翻开一本叫《花城》的文学杂志。他本来是跟文学有距离的，不仅仅他更多的关怀在民族的现实和价值王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精神涣散上，正像他在第二届唐君毅学术思想国际会议上的即兴发言所说，“杜惟明、霍韬晦和萧父诸先生辩讨唐君毅师承的道统

问题，在我看来是无意义的。古往今来的大哲都是从一个豁口中走来，他们怀着不忍之心，不相信天生人类，只是要他们穷尽苦难或堕落沦丧，岂有它哉”；而且，他“对中国当代诗歌吉普赛式的圈落风尚没有兴趣”，当代的中国文学，在他这样的局外人看来是“自外于当代中国（在一种阴郁乖怜的渠道里与中国毒素深广的虚无传统气息相吹），由称为实验、先锋的诗群领头的大规模的诗歌流亡，他们企图以僭越的步姿尽快跻身于西方诗歌大师之列。”“中国诗人从某日起，突然宣称，诗已穷尽对世界的表达，诗人正式退出‘公众生活’，他的对话起点是尼采、德里达、海德格尔、福柯、博尔赫斯、庄子、禅宗，以及亚当和上帝本人；诗人只满足于一名无所羁傍的隐逸的在语言深处的虚无之宫飘泊的占星方士，等等。”“具有与俄国流亡作家类似的背景的中国流亡诗人，其流亡与其说是一次痛苦的选择，不如说是一次任性和随意地流失或错位，他们的艺术成就，至今未超出对赝品、版式和范本的仿制；他们的被逐，既不是由于任何永恒事物的诱惑，也不是来自帝国的敌意，而仅仅是自身的短气和歧误。他们没有起始，却凭空攀附高处；他们没有过程、对象，却以世界本体自居；他们无力进入人类心灵，却轻易自戴桂冠。由于对基本事物的无知和对永恒事物的隔膜，由于不加节制地无端自恋，乔装超脱，由于对来之不易的诗权利和有限语言自由的滥用，更由于对诗人使命的背弃，致使他们被正当地拒之于世界诗歌生命循环之外。”鬼使神差，这一天的王康居然在小摊上翻起了文学杂志。

事情当然有例外。幸运的是，王康这样偶然地遇到了这个例外，他在这期（1990年第6期！）《花城》上看到了一首题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一首短诗使他积郁已久的思想、情感如火山喷发，《俄罗斯的启示》，一部十四万多字的作品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写就。就像大晴天里骤起的风暴一样蔚为壮观，火山喷发也使时空景象变换，人的生存及其环境获得了崭新的内容。不仅是对90年代初那样平庸的日子而言，而且在近百年的中国新文化建设里，《俄罗斯的启示》也是划时代的天地至文。

我在青少年时期读到梁启超谈论自己读龚自珍诗文的感受，说是“如受电击”，后人评说读梁启超的文章，也说是“如受电击”，我那时就一直在想那样的文字该是怎样的奇文，天地间真有那样的文字吗？龚自珍、梁启超的文字我也读到过，但他们的时代离我们太远，我们难得那时的同情、会心和彻悟；虽然在岁月坎坷里我们也逐渐读懂并回味起那些“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般的文字，但我总怀着期盼，希望看到文明的思想内容在当代的闪电，提升我们生活的质量天空。

[禁书网 大陆直连 https://goo.gl/C6xxGf](https://goo.gl/C6xxGf) 看 [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1995年冬天，何家栋先生电话里告诉我，有一个人你可以认识一下，这个人叫王康，现在北京搞一部“大统一”的电视片，没有工作，但这个人有学问，文章写得非常美。我那时正在编辑《战略与管理》杂志，我问能约稿吗？何先生说，怕是不行。我放下电话，犹豫

了一下，拨通了王康的电话，并没有说明由谁介绍，只是说我是谁，想来拜访，王康也没问，只是说，来吧。我就这样见到了王康。

我们都是性格内向的人，话语不多，只能一个一个的话题略显郑重地来过，他让我看了他撰稿拍摄却没有公映的专题片《大道》，我也给他看了我的长诗《众生北辰》。这一无目的的称得上“猝然”的相逢却让我很是服气，然而我们分手时却没有约定承诺，像是武侠小说里的两位剑客无意接触后比划了一番分手各奔东西，印证了武功，仍相忘于江湖。虽说我回来后给他寄过杂志也写信叙说过他的才华学识给我留下的印象，他也给我寄过贺年卡，说是要回重庆。我们很快失去了联系，他离开了原来的地方，听说他的《大统一》已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我找过他，但除了知道他是重庆人外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

1996年夏天，单正平来北京住在闽西饭店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聊天，还说这里有一个奇人你不可不识。奇人在他身边，听到我的名字说认识，单正平说人家说见过你。我问此人是谁，他说叫王康，他也刚认识一天，我说王康我当然认识。我们就这样再一次联系上。

随后，王康请我参加了几次文化活动。我也对王康的了解多了一些。他居无定所，总是在重庆北京两地跑，以布衣之身而忧国忧民，希望自己的思考、写作和社会文化活动能对民族的进步发展有所助益。王康对我谈论过当今社会的病症，知识分子以及暴富族们的关系，他说暴富族们虽然发展起来了，却不是一个健康的阶层，如果知识分子和大众传媒在80年代中期能够理性地对待那些企业家、老板或大款们，而不是向后者献媚，那么这个阶层也许会对社会的发展起积极的作用。民族的历史总是各个人各个阶层自私自利，一到危机关头，他们要么袖手旁观，要么独力抗击暴恶。因此民族虽历经磨难却长进不大。王康还想对本世纪的民族遗产进行总结，他说他想找一个载体，这个载体能把全体中国人吸附过来，集中全体炎黄子孙的智慧，发挥他们的创造力，这个载体，他认为就是中国的大统一。单正平告诉我，他那一代人已很少有王康这样的还在为理想而生活的人了，包括他自己也变得实际多了。我们那时都没有读过王康的文章，我们只是在交往、言谈中感觉到王康是一个真正有气象的人。

到1996年10月下旬，王康到我处给了我几篇文章，数天后的一天深夜，我躺在床上读他的近6万字的长文《俄罗斯的启示》，据说这只是部分，全文则有14万之多。我读了不到两页就从床上跳了起来，浑身像通了电一样不由自主，又像受寒流袭击一样颤抖不已。我停下来，生怕是幻觉，我从头读起。就是这样的文字！她原来真的存在，而且就在眼前。我激动不已地一口气读完，我确认这就是我一直在期待的文字，是我少年时期的梦想，王康圆了我的梦，那一夜，我仿佛进入了佛家所谓的钧天大乐的境界里。

第二天，我呼叫王康，在电话里我向王康抱歉说晚了几天才读他的文章，我说很感激，这么好的文章，我再努力十年也写不出来。王康说朋友之间说这话做什么事，我说是真的，我也许一辈子也写不出来。

这以后，我就时时翻阅，一次次地体验阅读的欢愉。我已不再有少年时那种遇到美好的东西独享秘不示人的心理，也不再有遇人就推销的习惯，生活苦难的历程已教我们明白人的思维的高深和情感的热度是不具有这种高度、深度和热度的人所不能理解的高深和热度。对于没有音乐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我将王康的文章复印几份给我认为可以看的人看，一些人征求我的意见，问可以自己再拿去复印吗，这是意料中的事，让我略感遗憾的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无动于衷。

过了一段时间，单正平写信来说，他近日去了一趟重庆，有机会跟王康在一起，了解了王康的一些情况，他说他这个年龄的人已很少佩服人，但他现在视王康为真正的英雄豪杰。他说他在王康那里读到了一篇文章，虽然只有一部分，但他认为已足以改写我们的文学批评史，这说法儿一点也不过分。他说，你一定得看看那篇文章。读到这样的信很是让人感动，在回信中我不免得得意地告诉他，你说的文章肯定是指《俄罗斯的启示》，我已经先睹为快了，我们的看法一样，文明史上那些让我们安慰给我们营养的事也出现在我们身边。

20世纪最后十年，对中国人来说，是如戏如剧又悲苦莫名无助的十年。在这之前，一场运动事件解构了中国各阶层之间松散的结盟，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世物质主义号召和“全民皆商”运动则消解了各阶层内部和职业分工中特有的品格。中国成为“沙聚之国”。“中国”一词对中国人来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非一种恒定的现实，而是一种经验和现象的奇特结合，是要变易的过渡型态，自然地，中国人也出现了身份认同危机，“我是谁？”“信仰何为？”“人生何在？”等等无可解答的安身立命的正名内容导致了中国人精神的溃败。

精神的溃败在行为上表现为人们的正义感和道德意识的淡化，在思维和写作的层面表现为人们责任感和批判意识的淡化。中国人的写作，也就成为一门职业写作，在这一写作里，找不到语言和存在的血肉联系，找不到诗和存在的性情关系，找不到写作者个人在语言中的位置，找不到写作在历史延续中的意义。这样指责汉语写作并不全面。因为任何时代的主流写作或说中心写作少有不是如此空洞、庸凡和劣化的。只有那些在边缘写作中以坚忍的心智辛勤劳作的人才有可能参与语言的生命创造，才可能成就有益于民族现实和未来的写作。所有民族和人类中最重大的声音、呼告，都是在遥远的极地，从这些生命起始传到人们耳际的。这些“精神烈士”，这些先知，都以其酷烈的人生际遇，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荣耀了民族的名。我们唯有对比历史和其他民族的实践，我们才明白健全的人性有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王康在《俄罗斯的启示》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精神的溃败是不能以客观现实作为充分借口的。任何个体，置身在生命的精神历程中都在时刻经受着拷问、锻炼，人们可以说今天消费主义的世俗观念深入人心，然而，龚自珍时代的人们也多在“为稻粱谋”；人们可以说市场经济、大众文化有助于消解意识形态霸权，然而，东亚一些经济繁荣国家仍没有摆脱封建的阴影（从而也仍没有摆脱政治和经济大滑坡的威胁，即黑金政治和泡沫经济）。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余年间，我指的是 1840 年至 1949 年，中国人也存在身份认同危机，中国人牢牢抓住了历史给予的命题，即解答外来的国耻和内在的强权，那时巨人辈出，猖介狂放，群葩争艳，性格万千，并出现了孙中山这样天下为公的民族英雄和鲁迅这样凝聚民族灵魂提升民族性格的伟大作家。

因而，精神在精神溃败年代里也在等待人性的闪光，汉语写作也就是这样在文字、信息爆炸般的生产年代里等待着烈士的鲜血。作为一种最悠久的文明语言，作为由孔子、司马迁、曹雪芹、鲁迅……以血祭过的语言，理应在历史的巨变关头找到新的人格形式，理应在民族的新生旅途中获得新的存在状态。因为被纳入世界文明大潮的中国社会，其声音、言语，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绝非幸运的丰富创造的产物，而是一种具有人类意义的中国命运的个人承担状态，只不过有人顺应，有人反抗，有人漠然，有人以个人的存在体现了一种关联无限的道理和性情。王康在《俄罗斯的启示》里，把自己的精神、信念和才情完美地表达出来，从而获得了与历史和域外那些最深刻的人类写作等量齐观的意义和效果。像单正平一样，我乐意向人们介绍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我愿意向这个人和他的作品表达一个写作者的敬意。